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理论及实践

程承坪, 邱依婷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1978 - 2016 年, 世界人口规模最大的中国, 其 GDP 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9.64%。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巨大的经济成就, 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而言, 一方面得益于改革开放后秉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所做的一系列开拓性工作, 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所做的一系列奠基性工作。新时代中国经济要实现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需要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方法论, 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二是建立政府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体制机制, 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三是提高消费水平, 实现共同富裕; 四是抓住第四次科技变革的契机, 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五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关键词: 改革开放后; 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实事求是

中图分类号: F0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 - 0566(2018) 02 - 0160 - 09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Sustained High Growth of China's Econom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CHENG Cheng-ping, QIU Yi-t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Between 1978 and 2016, an average annual rate of China's GDP was 9.64%, this is the economic success of a country with the largest population in the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ism, the reasons why China can achieve such a huge economic success: on the one hand, owing to the attitude that emancipates the mind and seeks truth from facts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a series of pioneering work which include establishing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aking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as the center, market-orien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implementing an independent and asymptotic opening-up policy and so on; on the other hand, benefited from the basic work done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eading the whole nation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new times, China's economy needs to shift from a high-speed growth stage to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 we need to do five aspects of the work for China's economy continuing high growth. First, we always adhere to the materialist methodology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carry out Xi Jin-ping's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new times. Second, we must establish the government's behavior and its gains and losses linked to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Third, we must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consumption, and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Fourth, grasping the opportunity of the fourth transform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economic structure. Fifth, we must implement innovation-driven

收稿日期: 2017 - 10 - 15 修回日期: 2018 - 01 - 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4ZDB03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7BGJ022)。

作者简介: 程承坪(1963 -) 男, 江西鄱阳人,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博士, 研究方向: 中国经济问题。

strategy and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novative country.

Key words: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sustained rapid economic growth;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ism;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一、引言

1978-201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达到了9.64%^①,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国GDP增长持续时间最长、增长率最高,而且又是在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创造的世界纪录,因而具有特别的意义。这一经济成就使得全球贫困人口骤减,1978-2014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7亿^[1],是第一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使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2]。正如美国最著名作家之一的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指出的“自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取得了全球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成就。没有其他国家经历过如此长时间的快速增长^[3]。”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上述骄人的经济成就,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而言,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它充分彰显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是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面临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然需要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总结这4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四个自信”,掌握中国道路的话语权,形成解释中国现象、解决中国问题、指导中国政策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指导新的实践,迎接新的挑战,破解新的难题。

迈克尔·斯宾塞(A. Michael Spence)对一国

或地区经济持续高增长进行了定义:“高”是指GDP增长率超过7%，“持续”是指超过25年^[4]。按照这一定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11个国家或地区符合这一标准。2007年,斯宾塞在《华尔街日报》上连续发表两篇文章分析了这11个经济体一些共同的特征:譬如功能良好的市场体系,高水平的储蓄和投资,人口跨地区和跨部门的流动性,微观层面上企业适应快速变化和抗风险能力的提高,以及经济全球化等^[4-5],但他没有专门分析中国高速增长的特点和原因。这一研究虽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但还不足以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

国内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在21世纪初就展开了讨论,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代表性观点。一是制度改革观。该观点认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变迁或改革是主要原因(张维迎,2010;周其仁,2010;吴敬琏,2012;韦森,2012)^[6-9]。二是要素利用观。该观点认为,人口红利、加大投资力度、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等是主因(蔡昉,2005;张军,2013)^[10-11]。三是需求推动观。该观点认为,扩大内外需、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和城镇化等是主因(林毅夫,2012;刘瑞翔等,2011)^[12-13]。四是综合论。该观点认为,经济体制的转型、政府大力推动经济增长、对外开放、中国特有的商业文化等是主因(谢识予,2000;叶飞文,2003;张五常,2009;韦森,2013)^[14-17]。上述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都存在局限性^[18],大多数从西方经济学角度或西方文化观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现象。我们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现象。

唐静等(2014)^[19]、靳卫敏(2015)^[20]、傅义强等(2016)^[21]以及李玲等(2017)^[22]虽然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分别强调了改革开放

①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7月5日采用新的核算法核算的1952年至2015年的GDP及其增长率的数据进行计算而得。

前 30 年对后 30 年的奠基作用,但对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和创新研究得不够,也没有指出改革开放前 30 年经济发展战略存在的问题。本文在上述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前奠基性工作积极作用^[23]的同时,也指出其存在的突出问题,着重阐述改革开放后所做的开拓性工作,最后对今后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出前瞻性政策建议。

二、改革开放前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做的奠基性工作

改革开放前所做的奠基性工作,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大发展创造了统一的大市场条件

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统一的中国就是一个大市场,它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 30 年(1919 - 1949 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四分五裂的状态,基本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建立起来了人民共和国,为构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没有国家的统一就不可能有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就不能享有大市场带来的分工深化的好处,也不可能构建体系完善的工业体系,因为只有统一的大国才有可能建立起完善的工业体系,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一个拥有全产业链的国家。

(二) 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 and 妇女解放运动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本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中央特别强调解决广大农村的卫生和教育问题,普及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创造了以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和民办教育为主要形式的低成本医疗和教育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男女具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力,消除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歧视女性受教育的陋习。1979 年中国农村小学净入学率达到 93%,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 30 个百分点,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青壮年文盲率从 1949 年的 80% 下降到

1981 年的 15%。国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 39 岁增加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 68 岁,达到当时的中等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水平,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初级卫生保健的唯一典范”,向全世界推广^[24]。

中国妇女的地位得到大幅度提高,“妇女能顶半边天”,妇女就业人数从 1949 年的 60 万人增加到 1977 年的 2036 万^[25]。

农村人民公社改变了两千多年来分散、单干的小农经济意识,培养了农民集体意识和组织观念,它为改革开放后输送有组织观念的“农民工”打下了基础。这一具有较高素质的男女平等的劳动者队伍,为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产业工人,创造了巨大的“人口红利”。

(三) 重工业发展战略和计划经济体制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工业基础和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能力

从经济史的角度而言,一国在没有受到外部干扰的条件下,经济发展应当遵循比较优势的路径,即轻工业 - 重工业 - 服务业。由于受到外部干扰,改革开放前 30 年中国经济发展没有遵循这一路径。为了应对外部敌对势力的侵扰,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可以说没有重工业发展的基础,中国不可能有两弹一星、运 10 大飞机等重大军事科技成果的诞生。在众敌环伺的国际环境下,没有这些重大军事科技成果就无法保证中国和平的经济建设环境。发展重工业也为中国培养了工人队伍,奠定了工业技术基础,这为改革开放后发展轻工业提供了工业和技术基础,使得中国的轻工业发展相当顺利和快速,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现在很多学者对计划经济体制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诚然,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一样都存在内在缺陷。然而,一方面,正如当时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一样,为了发展重工业,需要计划经济体制为其保驾护航。因此,计划经济体制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也为培养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能力

积累了经验,这使中国较为成功地应对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而且改革开放后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是对计划经济体制及市场经济体制的扬弃。如果没有改革前计划经济体制积累的经验教训,是不可能创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四) 重视农业发展为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输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旧中国农业生产效率低,农业科技落后,农田水利设施薄弱,分散、单干的农户无力兴修农田水利设施,更谈不上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人民公社组织农民一方面兴修水利,垦荒造田,扩大种植面积,另一方面进行良种改造,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使得水库总库量由解放前的200亿立方米增加到1976年的4200亿立方米,增加了20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共新建水库8万4千多座,灌溉面积比例由1952年的18.5%提高到1978年的45.2%^[26],灌溉面积增加两倍多,大量水库的修建提高了防洪抗旱的能力,对农业稳产高产起到了保障作用^[27]。20世纪70年代初,杂交水稻良种育成,经推广后,水稻单产量约提高20%。小麦、棉花、玉米等也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产量和质量得到大幅度提升。到1976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已经由1949年的2263.6亿斤提高到5726.1亿斤,亩产量从137斤提高到316斤;棉花总产量从1949年的888.8万担提高到4410.9万担,亩产量从22斤提高到56斤^[28]。农业机械化普及率大幅度地提高,从1970年的每平方公里10马力提高到1980年的每平方公里80马力,远高于当时低收入国家的每平方公里15马力和中等收入国家每平方公里60马力的水平^[22]。

正是由于改革开放前30年做了上述基础性工作,使得改革开放后联产承包责任制能够较好地发挥作用,为工业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如果没有这种基础性工作,那么改革开放后联产承包责任制只能回到解放前的农业状况而无法彰显其制度优势。

(五) 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放性探索为改革开放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鉴于苏联搞单一公有制存在的弊端,以及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照搬苏联做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受到挫折,毛泽东同志清醒地认识到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改革生产关系是错误的,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阶段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29]。”并且正确地认识到了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不但不能排斥甚至还应当充分利用私有制经济,强调学习外国的经验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独创相结合,不能照抄照搬,要学习对本民族有用的东西,保持本民族的特点,等等^[30]。

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认为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需要有一个商品生产的阶段,“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31]。毛泽东同志的这一重要论述为邓小平同志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性质分野以及党的十四大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三、改革开放后所做的开拓性工作

改革开放后,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在改革开放前所做基础性工作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开拓和创新工作^[32]。

(一) 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

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33]。”201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再一次强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34]。

首先,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政治路线严重地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以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号召。此后,党中央一以贯之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无论国内外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始终不改变这一发展思路。

其次,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计划经济被教条主义地当成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为了排除计划经济体制对我国发展生产力的束缚,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35]。”这就为党的十四大确立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除了思想障碍,为此后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最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体现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即市场主体平等原则。然而,我国长期以来存在较为严重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歧视现象,它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36]。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在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2016)指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是我们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指引下实现的。”“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想把公有制经济否定掉或者想把非公有制经济否定掉的观点,都是不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不符合我国改革发展要求的,因此也都是错误的^[37]。”

因此,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携手共进、和谐发展的局面定能实现,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

(二)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前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也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但实事求是地说,优先发展重工业也使中国经济结构严重被扭曲,人民日常需要的轻工业品严重短缺。自1979年开始,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中国工业结构开始做出重大调整,由脱离消费基础的片面注重重工业的发展战略转向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的轻工业发展战略。多年来老百姓被严重压抑的消费需求被充分释放,首先是以纺织工业为代表的轻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在1980-1985年的工业总产值中(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轻工业的比重迅速由47.0%上升到49.6%。由于轻工业进入门槛较低,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点,从而使我国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过去80%多的农民被排除在工业化进程之外,此时广大农民逐渐地融入到工业化发展进程之中,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人们吃穿的基本需求就基本得到了满足,消费结构不断升级,由“吃穿”转向“用”,家用电器等高档消费品供不应求。

受此刺激,家电产业投资强劲,此时重工业的基础作用开始发挥,家电产业需要重工业的支撑,这意味着此时重工业的发展具有了市场基础,对重工业的需求不断增长。这一发展路径恰好符合文一(2017)对工业化国家发展历程的考察发现的规律,即凡是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都走过了以纺织业为代表的“吃穿”轻工业,再到以“用”为特点的轻工业,再到重工业的发展历程,这是一国比较优势在起作用的过程^[38]。改革开放后有广大农民参加的工业化道路更加具有了市场基础,因而更有活力。一方面广大农民参加了工业化过程,使得中国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释放了“库兹涅茨效应”;另一方面广大农民既是工业化的参加者,也是工业产品的消费者,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强

劲的市场基础。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央政府扮演协调者的角色,而地方政府和社会是市场的两个重要主体,同时,地方政府间为发展地方经济开展“锦标赛”^[16,39],如图1所示。虽然地方政府和社会是市场的两个主体,但地方政府不同于社会,社会着眼于个人利益,而它着眼于社会整体利益,并以市场为导向识别问题、提出问题、制定政策、解决问题。这种市场结构是中国的特色,它是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诀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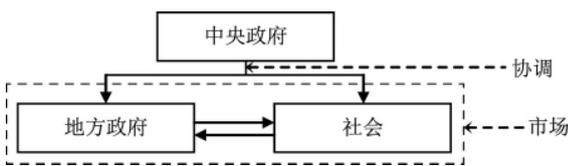


图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构成

(三) 实行渐进的、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政策

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发展经济都不可能拥有本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全部资源和市场。只有通过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才能克服资金、资源、技术等方面的制约。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经济都不能闭关自守,都应当对外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门洪华(2008)通过对中国两千多年经济史的考察指出,开放总是和繁荣昌盛相随,封闭总是与落后衰败同在^[40]。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在2008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1950年以来,年增长超过7%并持续25年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共有13个,包括巴西、中国、韩国、新加坡等。这些国

家和地区都有各自的特点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但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发展,其原因存在着共性。首要共性就是保持对全球经济开放^[41]。”

然而对外开放也有风险。拉美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就在于在对外开放的同时没有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结果形成了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依赖。历史的经验教训反复证明,如果欠发达国家不能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会导致其始终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产业,缺乏自主创新的能力,被发达国家所控制,变成发达国家的附庸,丧失经济主权。为了规避对外开放的风险,中国实行渐进的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政策。渐进对外开放表现在,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逐步扩大开放水平;独立自主对外开放表现在,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都要通过引进、吸收和再创新,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摆脱依赖别国,受制于人的局面,见图2所示。

中国实行渐进的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政策取得了三个方面的成效:一是充分利用了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克服了资金、资源等方面的制约;二是通过技术的引进和模仿,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充分发挥了后发优势;三是通过对外开放,充分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促进了国内改革。正因为实行了正确的对外开放政策,使得中国在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同时不断地壮大了自己。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只有206.4亿美元,在世界货物贸易排名中位列第32位,占世界货物贸易的比重不足1%^[42]。但自2013年起中国跃居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16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3.7万亿美元^[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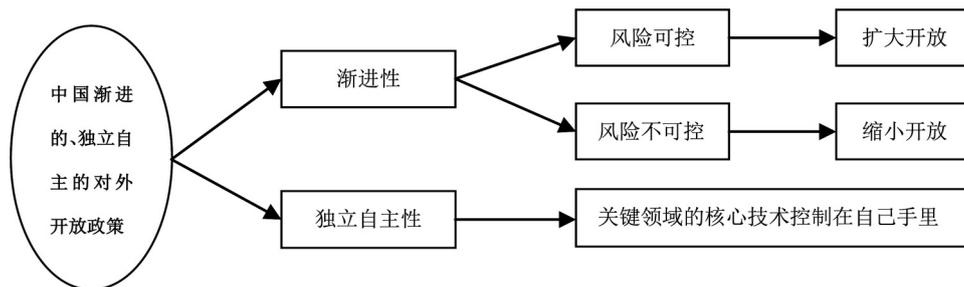


图2 中国实行渐进的、独立自主的开放政策

四、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在世界经济形势低迷的环境下仍然以不俗的经济增长率发展。但是未来仍然充满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我们需要在以往改革开放成就的基础上将改革进行到底,才能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为此,我们提出如下进一步改革的思路。

(一) 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方法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改革开放后之所以取得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方法论,突破了许多思想禁锢和理论教条,各项制度具有“可改革性”,一切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都可以学习、借鉴,从而避免了制度的僵化,使中国焕发了无穷的活力。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致力于以人民为主体的创新驱动,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永续发展理念。

(二) 建立政府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体制机制,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有效市场离不开有为政府^[44]。改革开放后之所以取得如此骄人的经济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有担当、有作为,如果仅靠有效市场是不可能实现这一经济成就的,西方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国家在同期的经济成就远逊于中国就说明了这一点。

但中国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认为就是政府负责任不够。市场之所以有效率,主要是市场主体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中国政府作为市场的主体之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中国政府还没有做到完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超产权理论认为,只要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能保证行为的有效性^[45]。我们认为,今后要加强法制政府建设步伐,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政府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体制机制。不但要规范政府的行为,

还要激励政府努力工作,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三) 提高消费水平,实现共同富裕

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要消除制约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短板。2016年底,我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为21496万人,占三次产业从业总人数的27.7%,而发达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这一比例不足10%,譬如美国只占5%。一方面,农业劳动力数量过多使得农业对农机产品的需求降低,制约了工业尤其是与农业生产资料相关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截至2016年底我国大陆13.7亿人口中乡村常住人口达到5.8973亿人,占全国大陆人口的42.65%,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得农民及乡村常住人口家庭收入低,近6亿庞大的低收入人口难以形成对二、三产业产品和服务的有效需求,这是制约我国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46]。因此,必须加快城镇化步伐,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实现以服务业为主导、以消费为主要驱动力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既能通过提高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水平从而大大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率,又能提高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从而促进农业现代化^[47]。

农业生产率低是制约我国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个制约我国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是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中国政府比较注重工程性基础设施的建设,社会性基础设施的建设相对滞后。因此,今后中国政府应加大对社会性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它既是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需要。

(四) 抓住第四次科技变革的契机,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人工智能是继蒸汽技术、电力技术、信息技术后的又一次科技变革,被称为第四次科技革命,人工智能又是人类继发明语言、进入文明社会以及工业革命后的第四次变革^[48]。这场全新的科技变革的核心是在信息化基础上的智能化,它将在极大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丰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许要重构人类生活、生产、学习和思维的方式。因

此,许多发达国家把它列为国家发展战略。国务院颁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表明中国也把发展人工智能作为国家战略,旨在抢抓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构筑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培育壮大人工智能产业,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并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五)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为了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认为可从以下七个方面着手:一是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倡导并形成创新文化;二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三是建设高水平人才队伍,培养造就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筑牢创新根基;四是强化基础研究,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五是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实施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实现重点跨越;六是深化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军民科技的深度融合,建立健全军民融合的创新互动体系;七是优化区域创新布局,以创新要素的集聚与流动促进产业合理分工,推动区域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整体提升。

参考文献:

- [1]统计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亿[OL]. www.chinanews.com,2015-10-16.
- [2]程承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提炼和总结六大经济实践经验[J]. 经济纵横,2017(10):27-34.
- [3]罗思义. 为什么中国经济形势远比美国乐观?[OL]. <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141119/081920859037.shtml>,2014-11-19.
- [4]SPENCE MICHAEL. Wealth of nations: Why china grows so fast [N]. Wall Street Journal (Eastern edition), 2007-01-23.
- [5]SPENCE MICHAEL. Wealth of nations: What drives high growth rates? [N]. Wall Street Journal (Eastern edition), 2007-01-24.
- [6]张维迎. 改革的逻辑[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 [7]周其仁. 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1):18-22.
- [8]吴敬琏. 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 [9]韦森. 大转折,中国改革的下一步[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 [10]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Z]. 中国金融论坛,2005.
- [11]张军. 张军自选集[M]. 太原:山西大学出版社,2013.
- [12]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13]刘瑞祥,安同良.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和转换展望:基于最终需求角度的分析[J]. 经济研究,2011(7):30-41.
- [14]谢识予. 经济增长的动因与中国经济增长[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5):47-54.
- [15]叶飞文. 要素投入与中国经济增长[D]. 厦门: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3.
- [16]张五常. 中国的经济制度[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 [17]韦森.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原因再反思[J]. 探索与争鸣,2015(1):58-63.
- [18]罗新远.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因:基于一个简化统计指标的解释[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77-86.
- [19]唐静,李鹏. 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关系的认识和思考[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9):7-9.
- [20]靳卫敏. 改革开放前后30年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与联系性[J].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6):72-74.
- [21]傅义强,王苑青. 改革开放前后三十年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J]. 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1):9-13.
- [22]李玲,江宇. 社会主义加市场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4):5-11.
- [23]习近平. 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N]. 人民日报,2013-01-06.
- [24]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
- [25]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 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

(下转176页)

variables , assumptions , problems and applications [J]. Acta Oeconomica Pragensia ,2013 ,2013(2) : 3-24.

[9]傅帅雄 ,罗来军. 技术差距促进国际贸易吗? ——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17(02) : 43-52.

[10]Kahouli B , Maktouf S. The determinants of FDI and the impact of the economic crisi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RTAs: A static and dynamic gravity model [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5 ,24(3) : 518-529.

[11]程中海 ,冯 梅. 中国对欧亚区域的直接投资是否促进了能源进口——基于一带一路产能合作视角[J]. 中国科技论坛 2017(05) : 101-106.

[12]Chang S C. The determinants and motivations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spatial gravity model approach [J]. Global Economic Review , 2014 , 43 (3) : 244-268.

[13]Subasat T , Bellos S. Governanc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A Panel Gravity Model Approach [J]. Latin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 2013 , 50(1) : 107-131.

(上接 167 页)

[26]董 忠. 下决心解决农田水利建设滞后问题[J]. 中国发展观察 2011(2) : 11.

[27]杨松林. 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M].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3.

[28]张伟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道路篇[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13.

[29]毛泽东文集(第 8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30]王 真. 毛泽东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准备[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3(5) : 11-17.

[31]毛泽东文集(第 7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32]程承坪 ,刘素春. 经济竞争与有效经济制度的演进: 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有效经济制度的演进为例[J]. 中国软科学 2009(10) : 23-31.

[33]邓小平文选(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3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35]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36]程承坪 ,邱依婷. 所有制歧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兼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J]. 学习与探索 ,2016(4) : 101-107.

[37]习近平. 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J]. 新华文摘 ,2016(9) : 1-4.

[38]文一. 为什么只有极少数国家能完成工业化? 中国给出了答案[OL]. [http://www.anyv.net/index.php/article-](http://www.anyv.net/index.php/article-1309848)

[14]PJ Buckley P Yu Q Liu et al. The institutional influence on the location strategie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from emerging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China's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16 ,12(3) : 425-448.

[15]Heckman. The common structure of statistical models of truncation , sample selection , and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s and a simple estimator for such models [J]. Annal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Measurement ,1976 ,5: 475-492.

[16] Mayer T , Zignago S. Notes on CEPII's distances measures: The GeoDist Database [OL]. CEPII Working Paper No. 2011-25 , <http://www.cepii.fr> ,2011-12.

[17]EIA. EIA short-term energy Outlook [OL]. U. 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 <http://www.eia.gov> ,2016-12-06.

[18]Jacques Meltitz , Farid Toubal. Native language , spoken language , translation and trad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4 ,2 (92) : 351-363.

(本文责编:辛 城)

1309848 ,2017-06-06.

[39]周黎安.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 经济研究 2007(7) : 36-50.

[40]门洪华. 从自力更生到开放型经济: 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路径(上) [J]. 新远见 ,2008(12) : 57-67.

[41]谢丹阳 程 坤. 包容性全球化探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17(6) : 13-49.

[42]中国对外贸易白皮书(2011) [OL]. <http://www.xinhuanet.com> ,2011-12-07.

[43]陈 恒. 世贸组织: 中国继续保持出口第一大国地位[N]. 光明日报 ,2017-04-14.

[44]程承坪. 有效市场、有能企业与有为政府: 基于科斯定理的思考[J].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 ,2015(4) : 46-54.

[45]刘苟佳 李 骥. 超产权论与企业绩效[J]. 经济研究 ,1998(8) : 3-12.

[46]张爱民 易 醇. 我国三次产业发展历程及政策启示[J]. 求实 ,2011(2) : 36-39.

[47]程承坪 张晓丽.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分离保障功能与经济功能[J]. 学习与实践 ,2015(11) : 27-34.

[48]克里斯·斯金纳. 中国正引导第四次人类革命[OL]. http://tech.ifeng.com/a/20171002/44705897_0.shtml ,2017-10-02.

(本文责编:辛 城)